



气候变化与五代两宋时期民族迁徙的初步考察*

齐德舜

摘要:五代两宋时期是我国气候冷暖变化异常频繁的时期,突变的气候导致北方草原草场萎缩和生态失衡,世居在草原上的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民族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迫于生计而不得不内迁以求生存。其中就包括在寒冷和干旱气候的双重压力之下契丹族大举南迁,在冷暖气候的交替影响之下女真族南下并最终入主中原。13世纪持续的寒冷气候产生的风雪灾害和干旱气候使北方畜牧业原有的自然环境产生了显著的变化,蒙古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从而不得不向外迁徙以寻求生存空间,以成吉思汗为首的部落集团选择以向外征伐的方式化解危机,最终导致了区域性人口的大规模迁徙。

关键词:气候变化;民族迁徙;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

中图分类号:K243;K244;K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5)02-0078-07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中原汉族受周边民族冲击或内部骚乱而不得不流散四方,北方游牧民族在环境突变压力下大举内迁,以及南方少数民族大范围迁徙等无疑是民族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事件。大规模民族迁徙对中国社会所带来的冲击与影响可谓巨大而深远,追溯民族迁徙发生的深层次原因,不仅具有极其复杂的内因与外因的双重政治经济机制,亦有长期被学界所忽略的环境突变因素。早在20世纪初期,美国著名地理学家亨廷顿在《亚洲的脉搏》一书中就指出气候变化理论能够解释许多历史变迁,因为气候的变化能够深刻影响一个区域的居住条件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诸如蒙古、吐蕃等游牧民族的迁徙便与气候变化息息相关^①。然而,气候变化引发民族迁徙的观点后来被我国学术界批判为“地理环境决定论”^②,相关研究也一度停滞。20世纪70年代,我国著名科学家

竺可桢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中将中国历史气候划分为四暖四冷期的同时,特别强调不同历史阶段中气候变化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③,气候变化与民族迁徙的课题重新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关注^④。

此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尝试从气候变化的角度探讨不同历史时期的民族迁徙,阐述民族迁徙与气候周期性冷暖变迁的对应关系,并且提出了许多颇具启发性的观点。亦有部分学者开始从宏观上注意到五代两宋时期大规模民族迁徙与气候突变之间的关系,并以契丹族和女真族南下与气候转冷在时间上的高度契合性来推断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性^⑤。然而,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五代两宋时期气候变化所引发的民族迁徙尚缺乏系统性研究,缺乏具体史实之论证与考察,研究结论显得较为笼统与薄弱。本文尝试从史籍中的气候史料来探寻五代两宋

收稿日期:2024-10-1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历史时期黄河流域气候变化与农耕文明演变”(22JJD77002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宋代汉文文献吐蕃词汇整理与研究”(21AZS008)。

作者简介:齐德舜,男,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开封 475000),主要从事宋史、民族史研究。

时期气候变化与民族迁徙更为确切的关联性。

一、寒旱气候与契丹族南迁

契丹族是唐宋时期活跃在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射猎,居处无常”^{[1]6167},以车帐为家。契丹族在北魏时期发祥于潢河(今西拉木伦河和西辽河),自兴起之后一直处于长期辗转流徙之中,如北魏太和三年(479年),契丹酋长贺勿于即“率其部落车三千乘,众万余口,驱徙杂畜,求入内附”^[2]。契丹族长时间、不间断迁徙的背后存在着诸多因素,除强邻的攻掠、政治扩张的野心等原因之外,气候之冷暖干湿变化亦是重要因素之一,“自时厥后,牛马死损,词讼庞淹,复遭风雨雪霜之害,中遂衰微”^{[3]4}。

契丹族崛起的唐末至五代前期,北方干冷气候依然延续,恶劣天气接连出现。光化三年(900年),全国遭遇异常寒冷天气,浙江地区连降大雪,富春江罕见封河十余日,“冬大雪,富春江冻合旬日乃解”^⑥。长安地区则遭遇长达数月之干旱,“冬,京师旱,至于四年春”^{[1]918}。天复元年(901年)先是春旱,“二月甲寅,以旱避正殿,减膳”^{[1]298}。从八月份开始到冬天一直到第二年春天又连续遭受水灾,“八月,久雨”^{[1]878},“自冬涉春,雨雪不止,民冻饿死者日以千数”^{[4]431-432}。持续两年的恶劣天气造成了严重的灾害,以至于到了父食其子、人肉贱于狗的地步,连皇宫和大臣家中都有因寒冷与饥饿而死者,“人肉斤直钱百,狗肉斤直钱五百,父甘食其子,而人肉贱于狗。天子于宫中设小磨,遣宫人自屑豆麦以供御,自后宫、诸王十六宅,冻馁而死者日三四”^{[4]432}。天复三年(903年)春天,南方则遭遇倒春寒,三月,“浙西大雪,平地三尺余”^{[1]937},到年底,气候异常寒冷,“十二月,又大雪、江海冰”^{[1]937}。受极寒天气影响,百姓困苦不堪,“民多流散,自冬经春,饥民啖食草木,至有骨肉相食者甚多”^[5]。天祐元年(904年)冬,浙东、浙西又连降大雪,“吴、越地气常燠而积雪,近常寒也”^{[1]937}。

在持续干冷气候的影响下,契丹族频繁且大规模向外征伐和内迁以求生存,天复元年,契丹族征室韦等,“连破室韦、于厥及奚帅辖刺哥,俘获甚众”^{[6]1-2}。天复二年(902年)七月,契丹

族以兵四十万伐河东代北(今山西代县以北地区),“攻下九郡,获牲口九万五千,驼、马、牛、羊不可胜纪”^{[6]2}。天复三年春,契丹族征女真并南下,“获其户三百。九月,复攻下河东怀远等军。冬十月,引军略至蓟北,俘获以还”^{[6]2}。天祐年间,契丹族先后两次征讨室韦,天祐元年“九月,讨黑车子室韦”^{[6]2},“明年七月,复讨黑车子室韦”^{[6]2}。

自后晋天福六年(941年),全国连续遭遇三年旱灾并引发蝗灾,“至八年四月,天下诸州飞蝗害田,食草木叶皆尽。……时蝗旱相继,人民流移,饥者盈路。关西饿殍尤甚,死者十七八”^{[7]1887}。天福八年(943年),全国范围内遭遇恶劣天气,“是岁,春夏旱,秋冬水,蝗大起,东自海墘,西距陇坻,南逾江、淮,北抵幽蓟”^{[8]9257-9258}。受蝗旱灾的影响,多年未南侵的契丹族于开运元年(944年)又开始了新一轮南侵。这年春天,契丹族同时南侵邺都(今河北大名东北)和郛州(今山东东平),“左龙武统军皇甫遇从少帝御契丹于郛州北”^{[7]1888}。这一轮进攻最终以开运三年(946年)耶律德光攻陷开封,后晋灭亡而结束。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年),契丹族又在冬寒之际以数万骑围困瀛州,由于难以适应恶劣天气,刘廷让全军覆没,契丹军大获全胜,“会天大寒,宋师不能彀弓弩,契丹兵围廷让数重。无救,全军败没,廷让以身免”^{[3]72}。

长时间的干旱或寒冷气候在引发契丹族南侵的同时,突然出现的恶劣天气则可能延缓契丹族南侵的步伐。后梁贞明三年(917年)夏,契丹围幽州,因天气太热而不得不解围班师,“望城中有害气体如烟火状,上曰:‘未可攻也。’以大暑霖潦班师”^{[6]12}。后梁龙德二年(922年),李存勖与契丹大战于镇州,契丹于胜利在望之时却遭遇大雪,为大雪所困的契丹军队因粮草不继而大败,“时岁且北至,大雪平地五尺,敌乏刍粮,人马毙踣道路,累累不绝,帝乘胜追袭至幽州”^{[7]400}。面对因大雪而导致的惨败,阿保机不得不感叹“天未令我到此”^{[7]1830}。后唐天成三年(928年)七月,契丹与后唐军队大战于河北,因天降大雨,契丹大败北逃,“时久雨水涨,契丹为唐所俘斩及陷溺死者,不可胜数”^{[8]9021}。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冬,契丹兵围遂城,最终亦因天寒而撤

兵,“会大寒,汲水灌城上,旦悉为冰,坚滑不可上。契丹遂溃去”^{[9]9306}。

除官方的强制性迁徙之外,契丹统治区内还发生过边将或民间百姓自发性迁徙以应对突变气候的情况。后晋开运三年,七月、八月、九月持续大雨,造成严重的洪涝灾害,“诏开封府,以霖雨不止,应京城公私僦舍钱放一月。……是月,河南、河北、关西诸州奏,大水霖雨不止,沟河泛滥,水入城郭及损害秋稼”^{[7]1118}。大雨之际,契丹瀛州刺史刘延祚举城内附,“城中契丹兵不满千人,乞朝廷发轻兵袭之,已为内应。又今秋多雨,自瓦桥以北,积水无际。契丹主已归牙帐,虽闻关南有变,地远阻水,不能救也”^{[8]9311}。辽穆宗应历二年(952年)十月,辽国所辖瀛、莫、幽州发生大水,十余万契丹及其他民族人口南迁宋境,“流民入塞散居河北者数十万口,契丹州县亦不之禁”^{[8]9484}。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河北地区又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燕地百姓大量南迁以求生存,“(辽开泰)八年,燕地饥疫,民多流殍,以佶同知南京留守事,发仓廩,赈乏绝,贫民鬻子者计庸而出之”^{[6]1353}。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年)二月,河北地区发生水灾,大批饥民南迁宋境,宋朝将他们分送唐(治今河南唐河县)、邓(治今河南邓州市)、襄(治今湖北襄阳市)等地安置,并分给田地,“三月,契丹饥,流民之宋境上。宋仁宗曰:‘皆吾赤子也,可不赈救之!’诏给以唐、邓州闲田,仍令所过州县给食”^{[3]80}。

五代后期,气候转暖,北宋以后气候愈发温暖,契丹所居的北方地区气候转暖益发明显。熙宁十年(1077年)至元丰元年(1078年),苏颂出使辽国,他曾记述了辽境内的暖冬现象,“东辽本是苦寒乡,况复严冬入朔疆。一带土河犹未冻,数朝晴日但凝霜。上心固已推恩信,天意从兹变燠旸。最是使人知幸处,轻裘不觉在殊方”^{[10]172}。在离开广平时,苏颂还记述道:“一向晴霁,天气温暖,北人皆云未尝有之,岂非南使和煦所致耶!”^{[10]176}受温暖气候的影响,辽国境内农业经济得到了空前发展,“辽自初年,农谷充羨,振饥恤难,用不少靳,旁及邻国,沛然有余”^{[6]932}。辽保宁九年(977年),辽政府仅半年就积蓄了十五万石谷,“辽之农谷,至是为盛”^{[6]925}。温暖气候所带来的丰足生活使北宋前中期契丹

族很少南侵,相反却是北宋王朝借北伐的名义向辽进攻,双方在景德元年(1004年)签订“澶渊之盟”后,和平的局面维持了近百年之久。宋辽双方能够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维持和平局面,固然与双方军事实力均衡、政治上相互妥协有直接关系,但北宋时期日渐转暖的气候所带来的舒适生活亦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二、冷暖交替与女真族南侵

宋哲宗元祐年间之前,史籍中很少有苦寒天气之记载,元祐三年(1088年),气候骤然转冷,“诏河东苦寒,量度存恤戍兵”^{[9]326}。元祐八年(1093年)三月,本应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却是“仲春以来,暴风雨雪,寒气逼人”^{[11]2096}。宋徽宗崇宁元年(辽乾统二年,1102年)三月,辽地“大寒,冰复合”^{[6]319},葛全胜等学者认为此次寒冷事件拉开了北宋末年中国气候转冷的序幕^⑦。女真族正是在寒冷气候的助推下登上了历史舞台,并且不断南侵最终入主中原。

女真族最初居住于黑龙江流域和长白山一带,主要从事狩猎生产,也经营部分农业。五代时期,女真族一直处于辽朝的统治之下,宋徽宗政和三年(辽天庆三年,1113年),完颜阿骨打继位,此时北方地区遭遇极寒天气,正月,辽地“大寒,猎人多死”^{[6]327}。十一月,北方又连续遭遇十余日的大雨雪,“连十余日不止,平地八尺余”^{[9]1342}。极寒和大雪天气使女真族不得不为生存而战,完颜阿骨打率兵与辽军大战于出河店(今黑龙江肇源西),女真人大胜,“杀获首虏及车马甲兵珍玩不可胜计”^{[12]25}。完颜阿骨打能够取得出河店大捷,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借助于有利的天气,“会大风起,尘埃蔽天,乘风势击之,辽兵溃”^{[12]25}。

出河店战役胜利的次年,完颜阿骨打建立金国,建元收国。立国之后,完颜阿骨打开始大举伐辽,正月攻下黄龙府(今吉林农安),辽朝自此失去北方军事重镇。同年十一月,北方再次遭遇极寒天气,“时盛寒,雪深尺余”^{[3]118},完颜阿骨打又乘极寒天气与辽兵展开激战,最终击溃辽军主力,“遂并渤海、辽阳等五十四州”^{[3]119}。在此之后,每一次极寒天气发生后的当年或次

年,女真人必会南侵,金辽或金宋之间也一定会展开一场激战,列举如下。

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年),北方大寒,“裂肤堕指,多有死者”^{[13]14}。次年正月,金将斜也率兵一万人攻取泰州,十二月,斡鲁古率兵攻占显州,乾、懿、豪、徽、成、川、惠等州皆降。

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年)同样是大寒之年,“十二月,大雪”^{[9]1342}。第二年,辽国遭遇严重灾害,“山前诸路大饥,乾、显、宜、锦、兴中等路,斗粟直数缗,民削榆皮食之,既而人相食”^{[6]338}。此后两年,金太祖乘辽国遭遇灾害之际率师亲征,并于宋徽宗宣和二年(辽天庆十年,金天辅四年,1120年)攻取上京。宋徽宗宣和三年(辽保大元年,金天辅五年,1121年)七月,金人欲再征辽国,但因连日大雨而不得不取消远征计划,“(金谋征辽)寻以连雨罢亲征”^{[12]35}。辽亡的宋宣和七年(辽保大五年,金天会三年,1125年),同样是大寒之年,辽帝逃亡途中遇大雪而被俘,“(正月)己丑,遇雪,无御寒具,术者以貂裘帽进,途次绝粮”^{[6]351}。

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又是大寒导致大灾之年,正月十八日,大雪导致京城多有冻死或饿死者,“甲申,大风雪,时围闭旬日,城中食物贵倍平时,穷民无所得食,冻饿死者相藉”^{[14]223}。从十月份开始,强寒潮南下,暴雪不止,十一月份,天气变得异常寒冷,十一月十八日,“天大寒,有冰蔽河而下”^{[14]476}。闰十一月,京师持续大雪,“盈三尺不止。天地晦冥,或雪未下时,阴云中有雪丝长数寸堕地”^{[9]1343-1344}。大雪几乎持续一月有余,金兵大举南侵包围汴京城,并在大雪中猛攻城门,“大风自北起,俄雪下铺地数尺,连日夜不暂止。金人于通津门及宣化门东立天桥数座,下瞰城中,炮伤王躔,足流血。范琼发兵千人,自宣化门出战,气甚锐,迫逐敌众,敌弃而北;士卒贪功渡河,未及北岸十余步间,冰陷裂,卒惊乱,金人临岸,效死迎敌,没者五百余人,自是士气益挫折”^[15]。大雪使宋军的战斗力大大下降,士兵有冻掉手指者,金将粘罕甚至称大雪等于给金人增添了二十万兵力,“是日,大雪。粘罕谓其下曰:‘雪势如此,如添二十万新兵。’金人乘大雪攻城益急……时大雪二十余日未止,风势回旋,飘雪响昼夜,如雷霆声……将士

负盾而立,不寐达旦,加以天寒大雪,平地深数尺,冻栗堕指”^{[14]519-523}。北宋都城开封最终在这一场极寒大雪天气中被金人攻陷,北宋灭亡,史载“自丙午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金人到阙,闰十一月二十五日大雪,金人陷京师。……丁未年正月二十五日大雪,极寒,气候与陷城日正相若”^{[14]708}。

金人定都开封、南宋定都杭州之时,中国的气候进入长达百年相对寒冷时段的前期,冬季气候异常寒冷,尽管金军乘寒冷天气频繁南下,但由于南宋军民的坚决抵抗,金军并未达到灭宋的目的,逐渐形成宋金对峙的政治局面。金军在黄河以北依旧可以凭借极寒或大雪天气向宋进攻并屡屡获胜,宋高宗建炎二年(金天会六年,1128年),金人在大雪之际攻陷延安府东城,“金人陷(延安)府东城,而西城犹坚守。……天大雪,世才战败,自是金兵专围西城”^{[9]13299}。宋高宗绍兴三年(金天会十一年,1133年)十一月,金军乘大雪和天寒地冻之际大举进攻和尚原(今陕西宝鸡西南),“是夜,大雪,道路皆冰”^{[12]1660},遂取和尚原。

然而,当金军渡过黄河继续向淮河以南进军之时,大雪或大雨等恶劣天气则成为影响金军南进的负面因素。宋高宗建炎三年(金天会七年,1129年)二月,金军挥师南下,本打算自泰州渡江,因遭遇大雨天气而使渡江计划搁浅,“继而天雨连降,平地水发,道途泥淤,马步俱不能进,以是贼心顿沮,不思渡江”^{[14]902}。宋高宗绍兴四年(金天会十二年,1134年)十二月,由于天降雨雪导致金军粮草不济,从而不得不选择退兵,“时金师既为世忠所扼,会天雨雪,粮道不通,野无所掠,至杀马而食,军皆怨愤”^{[11]3045}。宋高宗绍兴十一年(金皇统元年,1141年)二月,金军被宋军击败于柘皋镇同样是因为大雨,“初金人之退兵也,日行甚缓,至尉子桥,天大雨,次石梁河,河湍瀑。敌断桥以自固,列营柘皋”^{[11]3275}。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金大定二年,1162年),金人围困汝州同样受大雨所困,不得不引兵北去,“金人犯汝州,先以精骑渡汝河,守将王宣率亲兵迎战。自巳至酉,天大雨,金大败遁去”^{[16]3323}。宋孝宗隆兴元年(金大定三年,1163年),宋金大战于宿州城,善于骑兵作战的金人由于大雨屡屡被守将李显忠击败,“五月丙午,李显忠兵薄

宿州城,金人来拒,显忠大败其众。……金人恃骑射,夏久雨,胶解,弓不可用,故屡败”^{[11]3667}。宋宁宗嘉定十五年(金元光元年,1222年),金军将领额尔克同样受大雨所困,在淮河南岸被宋军击退,“是夕大雨,淮果暴涨,乃为桥以渡。南军袭之,全兵大败”^{[11]4405}。

金人的每一次南侵其实就是一次民族大迁徙的过程。如宋宣和四年(金天辅六年,1122年)十二月,金军攻占燕京(即原南京析津府),次年二月,“尽徙(燕京及其周围)六州氏族、富强、工技之民于内地”^{[12]1033}。金军从开封北撤时,从中原掳走十余万人,“华人男女,驱而北者,无虑十余万”^{[16]92}。大批女真族及其他北方民族在战后迁入中原地区驻屯留守,《三朝北盟会编》引《燕云录》记载金初攻入中原后在河北、河东各地留兵驻守,“每州汉人、契丹、奚家、渤海、金人,多寡不同,大州不过留一千户,县镇百户,多阙额数”^{[14]726}。金人入主中原之后,更是将大批女真人迁入内地,“遂尽起本国之土人棋布星列,散居四方。令下之日,比屋连村,屯结而起”^{[13]126}。

三、冷干气候与蒙古族南下

竺可桢认为,13世纪初,中国的气候重新转暖,逐渐过渡到长达两个世纪之久的“第四个温暖期”^⑧。葛全胜等也认为南宋中晚期(1200—1260年)为中世纪暖期的后期,“13世纪中国气候开始转暖,1201~1290年中国东中部冬半年平均气温较今高0.6℃,其中1230~1260年有可能是中国过去2000年中最温暖的30年,冬季温度较今高0.9℃”^⑨。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南宋处于“第四个温暖期”的说法基本被否定,这段时期应该仍然处于异常寒冷时期。张全明依据当时冬寒年份的记录所反映的气候与物候史实认为,南宋后期中国历史气候由“第三个寒冷期”进入“第四个温暖期”的说法并不成立,南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年)后中国仍然处于寒冷期,“据统计,自公元1201年至1279年的79年中,南宋临安地区有50个年份冬季严寒,涉及108次雪寒的记录,而涉及冬暖的则只有14个年份22次记录。从冬寒与冬暖的比例看,冬寒的年份是冬暖的年份的

近4倍,而冬寒的记录则是冬暖的记录的近5倍。可见,当时属寒冷期是无疑的”^⑩。美国学者加雷斯·詹金斯则以更为科学的研究方法对这一段时期的气候变化进行了研究,他把全球范围内已经获得的气候数据分为四个类型^⑪,列成一个简单图表并进行对比研究,最后得出结论,“很明显的是,公元1100年,在中国北方和内蒙古年平均气温突然开始下降。到公元1200年,有记录的数据表明年平均气温掉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低点,从公元前1500年算起,1200年的气温是有历史记录以来最寒冷的时期”^⑫。正是基于这样的研究结论,加雷斯·詹金斯认为蒙古人向外迁徙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草原气温的急剧下降,“在蒙古人大举侵犯的动机背后,一个重要的因素也许就是,从公元1175年到1260年间,蒙古草原上的年平均气温,出现一个持续的急速下降的现象”^⑬。

对蒙古南侵和西进的历史进行梳理就可以发现,蒙古人南侵与西进的时机与大寒之年高度契合,如宋宁宗嘉定五年(1212年)冬,气候异常寒冷,大雪从十一月持续至第二年春,“十一月,雨雪积阴,至于明年春”^{[9]1426}。正是在这年的十一月,蒙古军乘大雪猛攻金西京城,“是晚大雪,(金)国兵皆寒”^{[13]312}。宋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六月,天降大雪,成吉思汗趁机西讨回回国,“己卯夏六月,帝西讨回回国。祆旗之日,雨雪三尺。帝疑之,楚材曰:‘玄冥之气,见于盛夏,克敌之征也。’”^{[17]3456}。宋理宗绍定四年(1231年)则是难得一遇的暖冬,这年十二月,黄河并没有封河,蒙古大军南侵的脚步也因暖冬而暂时停止,“布哈曰:‘江路已绝,黄河不冰,彼入重地,将安归乎?何以速为!’遂不逐。明日,蒙古兵忽不见”^{[11]4510}。宋理宗绍定五年(1232年)正月,蒙古大军乘大雪击溃金军于三峰山,金军三十万大军无一生还,“辛卯春正月,睿宗军由洛阳来会于三峰山,金人沟地立军围之。睿宗令军中祈雪,又烧羊胛骨,卜得吉兆。夜大雪,深三尺。沟中(金)军僵立,刀槊冻不能举。我(元)军冲围而出,金人死者三十余万”^{[17]3522-3523}。后蒙古大军又趁寒冷天气向金发动新的攻势,最终逼迫金哀宗在宋理宗绍定六年(金天兴二年,1233年)迁居归德,再迁蔡州。

气温的下降仅是这段时期气候变化的一个方面,干旱则是另一个重要特征,“除1240~1265和1280~1338年相对湿润外,宋元时期大部分时间均处于干旱气候,且干旱程度远大于湿润程度”^⑩。严重的旱灾同样助推了蒙古人的迁徙,宋宁宗嘉定六年(1213年),北方和西北地区均遭遇旱灾,物价飞涨,“是岁,河东、陕西大旱,京兆斗米至八千钱”^{[12]542}。受大旱天气的影响,蒙古军兵分三路大举南下,破金河北、山东、河东等地90余郡,并在金中都乘大风天气击溃金军,“辛亥,(蒙古兵围中都,金)果勒齐出战,自夕至晓,北风大作,吹石扬沙,不能举目,金兵大溃”^{[11]4327}。金哀宗在迁居蔡州的天兴二年接连遭遇恶劣天气,六月先是大雨,接着又数月干旱,“六月,上(金哀宗)迁蔡,自发归德,连日暴雨,平地水数尺,军士漂没。及蔡始晴,复大旱数月”^{[12]545}。宋理宗端平元年(金天兴三年,1234年),蒙古与南宋联军攻破蔡州,金哀宗自杀,以漠北诸国“上国”自居的金王朝,终于亡于蒙古之手。

蒙古大军在灭宋的过程中也曾受益于天气的变化,宋理宗端平三年(1236年)九月,曹友闻与蒙古军大战于阳平关,受大雨影响,曹友闻战败身死,“会大风雨,诸将请曰:‘雨不止,淖泞没足,宜俟少霁。’友闻叱曰:‘敌知我伏兵在此,缓必失计。’遂拥兵齐进。西军素以绵裘代铁甲,经雨濡湿,不利步斗。黎明,蒙古以铁骑四百围绕,友闻叹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于是血战愈厉,与(弟)万俱死,军尽没”^{[11]4593}。此战过后,阳平关失守,蒙古大军自此打开了进军四川的门户。

由上可见,13世纪持续的寒冷气候产生的风雪灾害和干旱气候使北方畜牧业原有的自然环境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蒙古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从而不得不向外迁徙以寻求生存空间,以成吉思汗为首的部落集团选择以向外征伐的方式化解危机,最终导致了区域性人口的大规模迁徙。

结 语

五代两宋时期,突变的气候给契丹、女真、蒙

古等少数民族带来了不同的风险与机遇,改变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最终迫使他们不得不以迁徙的方式来应对突变的气候,“(游牧民族)必须服从的这种外来力量计有两种:一个是推力,一个是拉力。他有时被推出了草原,因为干旱的过程加剧了,甚至具有象他们那样的忍耐力量都无法再在他的原有生活地点生活下去;而此外,他偶尔也被拉出了草原,因为某些在邻近地区的定居社会里出现了真空,因此产生了吸力”^⑪。气候变化引发民族迁徙背后隐藏着很深的历史因果关系和合理性的解释,从气候—生态—经济—社会的连锁反应来看,五代两宋时期持续干冷的气候打破了北方草原生态平衡,生态失衡则直接导致草场资源的萎缩和牲畜的大量死亡,最终导致对草原依赖性很强的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民族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加之游牧经济本身的脆弱性、单一性、流动性和不稳定性,没有一套应对自然灾害的社会调节机制,最终只能依靠最为简便而有效的迁徙来摆脱生存危机。

气候变化引发的民族迁徙对五代两宋政治、经济和民族融合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北方游牧民族大量南迁并与中原民族相融合,逐渐学习到中原先进的文化和技术,推动了自身的发展。南迁的契丹各族改变了族群分布的单一性,形成了多民族交错杂居的局面,加速了民族间交融的历史过程。受冷暖交替气候影响而南迁的女真人,逐渐与中原各民族融为一体,生产生活方式逐渐与中原民族趋同,族际的隔阂逐渐消弭,以至于后来元朝将华北的汉人、契丹人、女真人视为一体。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五代两宋时期气候变化引发的民族迁徙促进了多元民族文化的融合与发展,加速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历史进程。

注释

①[美]亨廷顿著,王彩琴、葛莉译:《亚洲的脉搏》,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6、201、226、227页。②“地理环境决定论”作为一种学说和理论形成于18世纪的欧洲地区,其代表人物为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地理环境决定论在看待社会的发展和民族性格的形成时,只看到或只强调气候、地理环境等自然方面的影响和作用,而忽视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等社会方面的原因和作用。从总体上来说,地理环境决

定论是一种片面的理论。③⑧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④此时期关注气候变化与民族迁徙的文章主要有许倬云、孙曼丽:《汉末至南北朝气候与民族移动的初步考察》,载[美]狄·约翰、王笑然主编,王笑然译:《气候改变历史》,金城出版社2013年版,第144—166页;许倬云:《气候的变化对民族移动的关系》,载《历史分光谱》,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07—208页。这两篇文章集中论述了气候变化与北方民族内迁关系的历史逻辑。⑤张利指出我国气候的第三个寒冷期是公元1000年至公元1200年,对应的是两宋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契丹、党项、女真、蒙古南迁,战事频繁时期。参见张利:《气候变迁与我国古代北方民族的南下》,《许昌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王会昌认为五代北宋寒冷期引发了辽、金与宋室的对峙。参加王会昌:《2000年来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南迁与气候变化》,《地理科学》1996年第3期;刘昭民则提出宋代契丹族、女真族的寇边,元人的灭金和宋以及元室的覆亡均与当时的气候变化有直接的关系。参见刘昭民:《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⑥浙江省气象局:《浙江省气候史料》,浙江省气象局1978年版,第3页。⑦⑨⑭葛全胜等著:《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94页,第443页,第457页。⑩张全明:《两宋生态环境变迁史》,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23页。⑪这四个类型分别是:第一,从公元前5000年至今,挪威的雪线测量数据;第二,从公元前1500年至今,从冰岛、瑞士和阿拉斯加的冰层里,收集的冰川的测量数据;第三,从公元前1100年开始,在比较可信的资料中,如中国北方的文学作品和地方志中,记录的天气波

动情况,按时间加以编纂;第四,从公元850年至1700年,俄国东南部和南部的气候变化的记录,此类数据,或多或少是从俄国编年史里的资料,或从在俄国南部旅行的人的描述中得来的。⑫⑬载[美]加雷斯·詹金斯:《气候循环和成吉思汗崛起》, [美]狄·约翰、王笑然主编,王笑然译:《气候改变历史》,金城出版社2013年版,第172页,第170页。⑮[英]汤因比著、曹未风等译:《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11—212页。

参考文献

- [1]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2] 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223.
- [3] 叶隆礼.契丹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2014.
- [4] 欧阳修.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5] 李昉,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3351.
- [6] 脱脱,等.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7] 薛居正,等.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 [8]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 [9] 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0] 苏颂.苏魏公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8.
- [11] 毕沅.续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7.
- [12] 脱脱,等.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3] 宇文懋昭.大金国志校证[M].崔文印,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6.
- [14]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15] 黄以周,等.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M].北京:中华书局,2004:1827.
- [16]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8.
- [17] 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Climate Change and Ethnic Migration in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he Song Dynasty

Qi Deshun

Abstract: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he Song Dynasty, the climate change in China was extremely frequent. The abrupt climatic shifts led to the shrinkage of northern grassland and an ecological imbalance.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immense pressure created by these changes, the Khitan, Jurchen, Mongolian and other northern ethnics were compelled to migrate to the interior area for survival. Under the double pressure of a colder and drier climate, the Khitan undertook large-scale southward migrations. Subsequently, the Jurchen moved southward and finally established the Jin Dynasty. In the 13th century, snowstorms and an arid climate caused significant changes on animal husbandry compared with the original natural environment. Confronted with the unprecedented survival crisis, the Mongolian people also migrated to seek living space. Meanwhile, the tribal groups headed by Genghis Khan sought to address these crises by expanding their territories through conquest, ultimately resulting in large-scale regional migrations.

Key words: climate change; ethnic migration; Khitan; Jurchen; Mongolian

[责任编辑/晨 潇]